



已故中华总商会董事黄奕欢(上图)是当年“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主任。

一次沉重的挖掘



文：周维介

日治时期大检证蒙难者遗骸1962年出土记

1 942年农历新年莅临前个把月，新加坡华人已经没心思迎接春节到来，因为战争的厚重阴影笼罩着小岛上空，半年以来殖民地管治当局举行了各种演练，而马来半岛已有多处沦陷，战争的狼足鬣步，愈趋愈近，让人心生沉重的压迫感。位于大坡牛车水史密斯街与丁加奴街之间的“梨春园”戏场（今天的宏博梨春园酒店）原本夜夜笙歌，座无虚席，但除夕夜，鬼使神差，梨春园老板临时出了通告，宣布当夜停演。日本军机就在当晚来袭，几颗炸

弹扔下，梨春园被炸去半边，让人听着泛起一身鸡皮疙瘩。要是当夜戏园娱乐起众生来，重磅炸弹急急掉下，几百条人命是不能省的，真是老天爷有眼啊。说老天爷有眼，也不合实情，那晚小岛市区中弹的，还不止梨春园。那前后几天里，日本战机不停下弹，无数平民百姓无端端伤亡。残垣断壁、家破人亡、哀鸿遍野的镜头让这马年春节染满血腥、恐惧和哀伤。大年初一（2月15日），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了。三天后，日本军队祭出惨无人道的“大检证”，十万

市民遭遇屠杀，弃尸荒野海边，成了冤魂。

转眼72年过去。心思走远，历史脱了线。血腥的往事淡出了人们脑际，许多岛民知道新加坡从小渔村摇身变成了第一世界的摩登家园，对先辈曾经遭遇的战争与政治磨难却模糊不堪。人们忽略了新加坡中北部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战死的日军陵园，墓碑上刻记着战争贩子的名字；不知道当时有一份《昭南日报》，为侵略者的行为涂脂抹粉……模糊了的事太多太多，包括那座曾经高大、视野开阔，而今被淹没在摩登高楼群中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我是战后婴儿潮中的一员。为了让小学时代印象模糊的“血债血还”新闻立体起来，我上图书馆翻阅六十年代的报章，回放一些前辈的记忆，整理了1962年开始由华社启动的挖掘二战死难者遗骸行动。那一年，距离日本战败投降已有17载，受难家属的伤痕还未愈合，但那时华社的力量没有涣散，民间主导的挖掘工作，若干年后收割了一座丰碑，是对死难同胞一次沉重的告慰。

挖掘死难者遗骸的缘起

1962年，虽然新加坡还身披自治邦的彩旗，在英国人管治下过生活，但政治上风急雨大，政治新闻每天在报章版面蓬勃生长——人民行动党刚分裂不久，左翼力量退出一度让他们醉心的政团，于1961年9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从此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卯足劲，为各自的理想冲锋、陷阵、搏杀。另一方面，英国人也动作频频，推出了“大马来西亚”概念，尝试把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劳越、沙巴与文莱组合成新国度。马来西亚的概念

提上了议程，政治版图里的各方势力开始角力，支持与反对的辩论攻防，把当下时空炒得沸沸扬扬。就在这时（1962年1月下旬），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缤纷新闻里，冒现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新加坡发现了日治时期遭残杀者的遗骸，但小新闻持续上报、报导篇幅不断扩大，个把月内它成了吸睛大事。在中华总商会牵头下，华社全情投入，一次沉重的遗骸挖掘，最终成就了一座矗立市区的丰碑。

事隔21年，屠杀地点究竟如何暴露？是良心未昧的岛民提供了线索。1962年，全岛各地被发现的沦陷时期乱葬岗多达十余处。烈日炎炎，白骨见天日，燃起了遇难者家属深藏着的期待。悲情决堤在所不免，但媒体的报道、华社的动作，无异于提供了一个抚伤的平台，为压抑的情绪疏导。上世纪九十年代联合早报合唱团指挥黄晚成女士在蒙难者遗骸出土后两三天，把自己多年的伤痛投书南洋商报，那时她33岁，如今丈夫已经遭难21年。黄晚成回忆，日本占领新加坡的第三天，获悉日军要全岛华人男子到不同地点集中的消息后，她陪同丈夫从武吉知马到东陵区友人家，屋里的四名壮丁在隔天早上一起到小坡集中。到了那里，却又因为人太多而被赶往四马路附近，随后又被骑脚踏车的日本兵带到“水廊头”的一所空屋里去，他们在被日本兵包围着的屋里过了一夜。翌日，他们被告知，妇孺先回家，男人留下。那时他们认识的九个朋友当中，有四人的衣襟被盖了印，他的夫婿王祖辉是其中之一。到了半夜，他们被送上卡车，从此不知所终。这一别，就是永远。黄晚成这回投书，陈述了大检证后丈夫一去永别的心路，数万余蒙难者家属长久

的善后期待，在华社凝聚意志的动力下，也闪现了微明的烟火。

1962年前半年时间里，从全岛各角落挖出的骷髅白骨，大多无法印证死者的身份。幸运些的，有若干遗物陪伴出土，证实了冤魂的蒙难地点。这一丁点物证，已足以告慰广大无助的心灵。挖掘蒙难者遗骸的工程，最终选择了建造纪念碑的方式，把遗骨体面地集体掩埋，这是在世者仅能表达的一点心意。

东海岸七英里山谷遗骸挖掘现场

1962年在新加坡全岛的二战蒙难者遗骸挖掘过程中，以东海岸七英里山谷出土的遗骸报道最轰动。东海岸七英里，是昔日的地理称谓，旧资料显示，此处当年的准确路名是“惹兰培本”，它附近有山头，也有山谷，山谷上头有一所名为“培本学校”的乡村华文小学。学校背后的山谷，不幸成了日军屠杀本岛居民的重要地点。据当年虎口余生的幸存者透露，当年日军押着蒙难者分乘整40辆大卡车前来，每辆装载五六十人不等，估计无辜受难者多达两千余名。

惹兰培本这路名已不复存在。某日，我从图书馆的显微影片阅读室出来，便向老文化人杨善才打听培本小学的所在。巧的是，他说学校就在他老家边上。1962年，他也曾到东海岸七英里山谷现场见证挖掘情况。当年他老家就在培本学校的小山上。这所华文小学由当地村民集资设立，创建于1920年左右，学校所在的那条村路，名为惹兰培本。独立后，培本学校一带的小山头都铲平了。

这则挖掘遗骸的新闻刊登后，牵动了华社的心情。新闻之所以轰动，



不光是挖掘工人动手起锄引来无数围观的人群与蒙难者家属前来凭吊，更因为现场来了当年屠杀事件的目击者与幸存者。那天，培本学校校长吴扬声在现场引导工人挖掘，也向记者描述了21年前的恐怖经历：1942年正月初九天公诞，清晨七点左右，三十余名手执水壶、身带寒衣的华人男子在日本兵的押送下穿过培本校门，从山上的小路走向山谷，日本兵也同时把五十几位村民赶离村子，到半英里远的树林里去。当天傍晚他回返村庄，发现住家附近的山谷有五六个土坑，尽是被枪杀者的尸体。

那场屠杀，在一排排的受刑人队伍里，有一位名为赖向荣的中年人，他是东岭学校的校长，有幸在子弹流窜中死里逃生，捡回一命。挖掘当天，赖校长在现场向记者描述了当年九死一生的经历。1942年春节的某个早上，他在芽笼40巷的家里被日本兵押走。他估计，沿途被押的成年市民有一两千人。当晚，他们在直落古楼的洋房周边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又被集中到附近一所英校的草场上。接下来的事，是生死的判决。值勤的日本兵高喊：是义勇军的举手！是资本家的举手！医生举手！小商人、教员、工人举手，大家都根据指示回应。当时很多日本暗探夹杂在人群

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检查完毕，他们被分成一小批押到不同的地点集中，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被释放回家。他们一千多人被关了五天五夜，他那组教员有73人，几天都没米饭吃，后来他们在被囚禁的洋房里找到一桶饼干充饥。

死亡之神在初九早晨降临，天亮时，日本宪兵派了36辆罗厘来到，第一批被押走的是40余名义勇军，接着是40多名资本家，再下来是两车教员，一车医生，加上其他各界人士，一共载走36车，每部卡车上都有六名日本宪兵把关。到了惹兰培本，受难者被分成六人一排，手连手互绑在一块，一边绑胳膊，一边绑手腕，走到学校后面的山谷中，土坑已经挖好，等着他们赴难。走近山谷时，他们目睹了前面的那排同胞被机关枪射倒了。死亡近在咫尺，千钧一发之际，赖向荣有幸挣脱了绳子，乘日本兵不备，他自行跳进坑里，再从弯弯曲曲的泥坑道逃跑。日本兵发现了他，立即开枪追击，他狂奔，左脚中弹，所幸只是皮肉之伤，他逃到一名马来人的家后，躲进树林，餐风一宿，隔天才逃离村子。

挖掘日，许多被日军残杀者的家属来了，希望新翻的泥土里冒现亲人在21年前随身佩带的物件，作为辨

认尸骨的证据。随着锄起锄落，他们的思绪翻腾滚动，母亲哭着爱子，妻子忆着夫君……岁月，无法淡化他们心中的想念。前行动党中委胡书珍也来了，她“希望能见一见她弟弟所遗留下来的白骨”。她的弟弟胡诗棉活跃于当地社团，是宗亲会馆会长，也是星华义勇军负责人之一。1942年正月初八，他在大坡珍珠巴刹被逮捕，诀别了娇妻，留下六名幼子。日军以机关枪向他扫射时，他只有38岁。

现场有一名四十来岁的寡妇，手持着丈夫的“华侨登记证”，在土坑旁痛哭，要求工友再掘一掘土，让她寻找魂牵梦绕的尸骨。21年前，她丈夫在芽笼41巷工作时被日军押走，从此就没了下落。她向旁人展示——“这是他的照片”——陈年的旧照，该是支撑她存活21年的主动力。到场的目击者中，有两位是还住在山谷路口的潮州村民。蒋俊葵，72岁；梁木向，五十余岁。蒋俊葵忆述，那年正月初八下午时分，日本兵来到村里，用枪支指使几十个村民到山谷附近挖掘土坑，他们以为是要建造防空洞，没想到大年初九，天一亮全体村民被令马上撤离村子。日军从别处载来了一车车华人，从路口走到山谷的土坑前，就地集体屠杀。村民在附近山头躲着，一阵又一阵机关枪扫



工作人员在各地将出土遗骸清理后装入骨罐，以待重葬。

射声传来，村里冒起了浓烟。傍晚六七点钟，枪声止息，他们回到村子里，房屋化成了废墟。

在山谷引导工人挖掘的郑亚德，也是惹兰培本村民。他指着某处，工人动锄挖掘，很快就挖出了一堆残骸。在场的中华总商会董事黄奕欢惊呼：“看，脑髓还在！”郑亚德听着黯然神伤，记忆定格在屠杀当天，他目睹一名妻子眼见丈夫被枪决，抱着年幼的孩子冲向前，拥尸痛哭，一旁的日本兵索性把这对母子也一块活埋了。21个春节走过，山谷里第一回大面积的挖掘，丛林里发现了一个个集体埋尸的大井，一堆堆死难者的头盖骨、肱骨、腕骨，还有伴着尸骨出土的手表、裤带、茶杯、捆绑在白骨上的腐烂绳子、几片鞋底，几颗生锈的子弹、一缕缕盘升的冤气……当下的和平空间里，山谷枪声，隐隐在死难者家属脑海中回响、盘旋。

“大加头工地”遗骸挖掘现场

1962年那场挖掘，另一个地点在实龙岗的“大加头”工地。它的准确位置在哪？南洋商报的新闻提到，这个工地正在为“杨厝港精神病医院兴建工人宿舍”，那就是当年的板桥精神病院了（“板桥”之名今已弃用，改称“新加坡心理卫生院”）。3月2日，

工地上挖掘出残骸，众多闻风而至的蒙难者家属中，一名神情哀伤的老妇人告诉记者，她丈夫和儿子都被日本兵活活刺死。蒙难之日，她的长子差一天24岁，幼子差一天18岁，“我的男人和我”那时都只有40岁。当天，日本兵到她家搜查，架走了她家的三个男人，他们就地跪了好久好久，后来……话接不下，她心潮澎湃，却没有流泪，记者如是描述。

前几天，也是在这个“大加头”工地上，打桩工人从黄土里掘出一片头盖骨、二十来块零星骨头、几颗金牙、几个银币……几天后，中华总商会负责人来到同个现场，黄土里露出十几副比较完整的难胞遗骸。21年前，牙科医生陈南赐在这里惨遭杀害。他的妻女在出土遗物中认出了属于亲人的戒指，悲从中来，持久的哀号让人心沉谷底，一次挖掘，是一次死亡的确认、是一场大屠杀力证的出土。

“万国园”遗骸挖掘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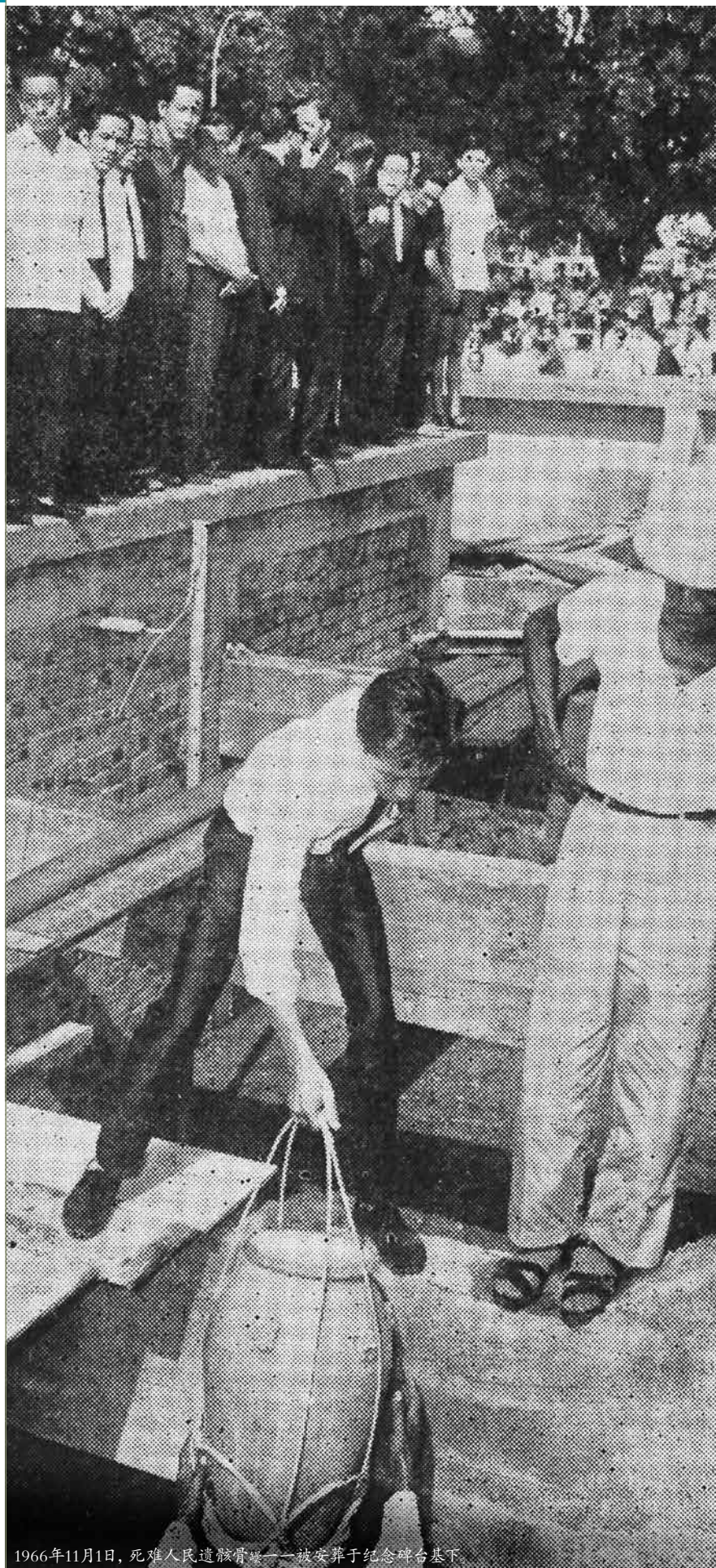
“大加头”工地挖掘遗骸的新闻见报后没两天，南洋商报打出这样的标题：“日军草菅人命铁证如山/杨厝港万国园胶林昨又掘出烈士白骨/村民追述血淋淋一幕”。这个挖掘地点在“杨厝港九英里”，根据新闻提示，那是“惹兰加由（Jalan Kayu）万国

园”树胶林。当天，工友掘不到三尺土，就露出一束褪色的头发、几个生锈的银角、一顶破烂的绒帽，还有几堆被电线缠绕着的枯骨。村民告知，这回挖掘的三个土坑，埋了百多名受难者。日本兵在杨厝港检证后，用电线把难胞三几人一组捆绑，把他们押到这片胶园后，枪尖下一刀一命，一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崩散。

在检证时逃出虎口的村民苏正春对记者说，当年他住在胶林附近的“无线电脚碗窑”村落。21年前农历正月十四早上，几个杀气腾腾的日本兵荷枪佩刀，来势汹汹到村里搜查，同时命令男女老少到附近的杂货店搬罐头，他见势不妙，便假装肚子疼溜到厕所去，再躲进附近的丛林。日军发现他失踪了，四处搜寻，他吉人天相没被逮着。当天傍晚，那些被押走的村民都在胶林里遭杀害。

榜鹅海边遗骸挖掘现场

万国园新闻见报约两周后，东北部榜鹅尾海边挖出了发黑的尸骨。五名工友在洁白的沙滩上开挖了数十平方英尺的面积，还不及半英尺的深度，便让一堆黑骨见了天日。骨头长年埋在受海水浸蚀的沙地里，早已变黑，残骸支离破碎，只有一具变黑的头颅还算完整。其他的寻获，是



1966年11月1日，死难人民遗骸骨殖一一被安葬于纪念碑台下。

40余支大腿骨和手臂骨，沙与骨之间夹杂着子弹壳，大颗的是机关枪子弹，小的属于步枪，约有三四十颗。

挖掘小组负责人黄奕欢在榜鹅海边对居民说：“当年日本人在桥上和岸边架起机关枪，把百姓押到沙滩上，命令他们排成一排，对准他们咯咯咯扫射。当时被日军拉来这里枪毙的无辜百姓有17卡车之多。”人群里一名妇女叹息了，记者问她是否榜鹅当地人？她住在美芝路（Beach Road），老远跑来这里，为的是“看看”二哥的尸骨。她回放21年前的岁月胶卷：日本军在后港、巴西立（Pasir Ris）等地检证，把无数男子收押了。她二哥是在巴西立被带走的，和他一起被押的有120多人，其中有几个侥幸逃走，几个被释放，其他人全被带到榜鹅海边杀害。她说那场战争，她大哥被日本飞机炸死，二哥被枪杀，她当时年纪小，看着双亲的眼睛都哭肿了，天天呆坐门口望子归来。

一名白发苍苍的马来老人来到海边，描述让他毕生难忘的场景：那天晚上，日本兵载来几百名华人，用枪尖逼迫他们走向沙滩，列队一字排开，先命令前排的百姓自己挖坑，坑挖好了，机关枪就对准他们扫射，他们瞬间倒下，日本兵接着命令后排的人把尸体推入坑内，再自己挖坑，如法炮制，把所有被押来的无辜居民血洗精光。当时啊，血染红了沙滩。马来老者说，有一名华人中弹倒地，但没有断气，日本人走后，他挣扎着爬起来逃走了，现在还住在杨厝港。老者对众人说，离开挖掘现场不远的另一片沙滩，也是日本人坑埋死尸的地点，黄奕欢听后表示将派人前往挖掘。

半世纪后，这群小朋友已老成花甲之人，他们曾经在炽热的炉边生活着，却不一定明白大炉里煎熬的是怎样的政治菜肴。历史就这样默然向前滚动，它书写的字迹，因个人的老花程度而呈现不同的清晰或模糊状态。我随着显微影片的镜头，看到的不过是许许多多的历史碎片，透露的是“大检证”千万悲剧中单薄的段子，一时无法让画面完整构成，却也感知到这次挖掘，让长期包扎着战争精神疼痛的岛民，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宿。

隔天，挖掘队伍又在榜鹅海滩找到四五个完整的头颅骨，支离破碎的遗骨装满两大箱。傍海的一棵大树上，他们发现了一个挂在枝头的骷髅。附近的马来渔民透露，这个骷髅头给发现时，乌黑似炭，他们把它挂上树，风吹雨打多时，发黑的骷髅又变白了。

一名住在附近的年轻渔夫告诉记者，十多年前沙滩上常见浮现沙地的白骨，他父兄日夜目睹这种恐怖画面，都先后病死。他报料，也许是冤魂显灵，当年主持这场屠杀的日本黄旗部队军官，事后在岸上的司令部洋楼跌死。

其他遗骸挖掘现场

黄奕欢在1962年2月份的董事会中报告，市民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为这次挖掘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线索。是年经过探查确定有屠杀事件的地点包括：东海岸七英里半的大山谷、樟宜三百依葛的胶园、武吉知马南洋女中后面维多利亚园的山丘上、南大云南园、惹兰加由万国园、实龙岗建屋工地、樟宜马打鱼干、乌敏岛、格兰芝路黄梨厂附近的海滩、军港三

巴旺西河园、三巴旺甘榜登雅假日营海边、直落亚逸爱同学校、美芝路铁巴刹附近的海滩……这只是日军恶行的冰山一角，以后的三四年，岛上被发现的屠杀地点，多达二十余处。

挖掘遗骸行动于1962年初启动，延伸至1966年10月，历时五年，出土的遗骨装满了605坛。单单惹兰培本就装了428坛，榜鹅海边（21坛）、武吉知马肯士路（37坛）、惹兰加由（10坛）、樟宜十英里（37坛），这几处的坛数共计533坛，约占总数的88%。

挖掘骨骸曲折路

1962年2月18日工作队在东海岸挖掘出遗骨后，二战期间日军滥杀无辜罪行的实证浮现了，华社主动点燃的搜证与遗骸善后行动正式有序开展。中华总商会董事黄奕欢在现场对记者发言，发出两点信息：其一、总商会决定向日本政府索偿；其二、华社将为挖掘出的遗骨集体埋葬，并立碑缅怀。

2月27日南洋商报报道，总商会近期将讨论寻骨安魂以及向日本政府索偿的步骤。日本驻新加坡领事馆也告知媒体，已经把新加坡民间挖掘

二战蒙难者遗骸，以及华社高涨的索赔意愿这两点信息呈报日本政府。日本领事馆发言人对记者坦言，他对当年受难的新加坡人表示“对不起”，他自己“心里也很难过”，不过这件事已经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过去通过与英国政府的谈判解决了”。

3月1日，媒体刊登了中华总商会成立“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的消息。委员会由黄奕欢担任召集人，有14名委员，他们是卓经端、林应标、洪永安、蓝天、沈孔、符致逢、叶平玉、庄卓岩、梁润之、梁均安、汤景贤、郭佩弦、周镇豪、江克武。总商会会长高德根阐述了成立委员会的目的：“日军屠杀我邦同胞的滔天罪行，虽然人民容忍了二十一年，但大家绝不会忘记这件大冤仇。我们在调查和探寻死难人民遗骨的工作中，千真万确看到了罪证如山。商会将以和平手段有计划有秩序地处理此事。”他呼吁“政府对不少孤儿寡妇在‘绝命谷’中痛哭哀嚎，应以人民的苦难为苦难，替本邦百姓向日本交涉赔偿问题。正当目前世界还在冷战的时候，我们从土里挖掘出历史的惨案，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这是一种爱

和平、反战争罪恶的启示。”他告知媒体，这项工程浩大，经费不菲，总商会应该负责，钱用完了再想办法。

善后委员会洪永安委员在会上表达了下列看法：日本在新加坡沦陷期间向本地人民勒索五千万的“奉纳金”，这笔债十分可观，因为战前一斤米不过几分钱，今天则是一斤几毛钱，整整高出十倍之多，所以日本理应偿还本邦人民五亿元，这还不包括利息在内。他认为“日本让本地居民无辜丧命，性命的损失无法计算，而当时日本向本岛居民勒索的钱财更得归还，日本的罪恶滔天，赔偿给老百姓是天公地道的事。”

黄奕欢在同一天的董事会上报告，总商会代表日内将会见政府代表，报告寻找与挖掘死难同胞遗骨

的最新情况，并要求政府在精神、物质和工作上给予协助。他在会上坦率批评英国政府的消极作为：和平后，英国政府在本地审判日本战犯屠杀平民的惨案时，对惨案地点必定有详细的记载，英国驻本邦最高专员理应给总商会提供一份这方面的文件，商会才能在全岛进行更全面的调查。每个国家在和平后都为死难人民安葬，但是殖民地政府对散埋四处的受难者遗骨置之不理，格兰芝纪念碑纪念的是英国军人。英军在荷兰路和樟宜一带挖掘遗骨时，发现不是英国人的骨头，便当场弃置，这种做法不近人情。

他说，“现在是民选政府的时代，政府对人民的苦难决不可推卸责任，政府请拨出一块适当的地方，安葬死难同胞的枯骨。同时政府应为民请命，向日本交涉赔偿。政府在上精神上、物质上和工作上，应和商会共同合作，不然死难的冤魂会去找做官的。”他也批评“有些无聊的‘文丐’，这次胡乱污蔑商会发动此事带有政治作用，对这批无耻之徒，应给他们一种无情的打击。”黄氏的发言，包裹着若干不满情绪，挖掘遗骸的背后，仿佛淌着暗流。

对于安葬死难遗骨的工作，黄奕欢建议把所有骨骸集中一处，暂时寄放在福建会馆咖啡山的四脚亭内。至于是否采用火葬仪式处理遗骨，必须先了解蒙难者家属的意见再定夺。他认为善后工作最重要的内容，是在公坟地点建造一座“气魄雄伟的纪念碑，作为新加坡人民爱和平、反战争的象征。”

总商会的决议，得到当时华文媒体的积极呼应。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分别发表社论，谴责日军当年的

暴行、为大检证中受难的同胞申冤、支持总商会筹划设立蒙难者纪念碑的建议。这项行动，也获得社会主义阵线主席李绍祖、人民统一党领袖王永元、人民联盟秘书长李金泉表态支持，认为赔偿受难者家属是日本政府无法回避的战争责任。

日本领事馆发言人的谈话见报后，各界强力反击。总商会会长高德根直言，日本领事馆发言人的观点“根本无需重视”；南洋商报综合了舆论的看法：“日本屠杀我邦同胞，有赔过什么钱？数万难胞的家属忍痛了21年，连半分抚恤金也没有拿到，这笔惨绝人寰的冤债，何时已经解决？怎样解决？有谁知道？”

同一天，新加坡大学国际法专家格林教授针对本地人民向日本政府索偿一事表达看法，他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国际法的规定：“从一般原则看，无论是你我是，都没有向外国政府提出直接要求的法律权利，个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地位的，只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来往才受到国际法的承认。”恰逢其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总秘书蒙罗前来新加坡出席国际问题学会在新大举行的研讨会。本地记者要求他针对索赔一事发表意见，他表示在新加坡提供充分的事实之前，他无意批评日本的二战赔偿问题。

为了协助读者理解向日本索赔的背景，南洋商报记者洪锦棠于3月3日发表《检证惨案始末》一文，叙述他在战争结束后旁听军事法庭审讯战犯的经历。这篇特写提到日本人篠崎護在战犯审讯期间建议赔偿每位华人两万元的供词。向日本索偿成为全岛热门话题之后，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回应，当下自治邦政府没有与日本政府正式谈商的计划，当财政部长



善后委员会在“日治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附近为安葬于台基下的死难人民遗骸所立的丰碑。

吴庆瑞博士访日时，有机会他或与日本官方私下谈商。

回首1962年中华总商会主导的二战遗骸挖掘工程，过程并非一路顺畅无阻。它面对的第一道关卡，是从速解决挖掘遗骸准证的审批问题。是年2月初开挖工作启动时，总商会并没有申请挖掘准证。2月28日善后委员会成立后数日（3月初），总商会正副会长以及委员会召集人联袂谒见政府，报告发现与探查遗骸的经过。3月13日，总商会正式向卫生部申请挖掘遗骸准字。六天后，黄奕欢率领总商会代表与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会晤，商讨挖掘遗骸事宜。16天后，遗骸挖掘工作已进行个把月，总指挥黄奕欢告诉报界，虽然工作队在全岛多处挖出不少遗骨，“但卫生局的准字却迟迟不发给商会，否则马上可以展开全岛性的拾骨工作……商会已经申请了三个星期，而始终石沉大海，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月2日总商会再度致函政府，告知下雨造成泥浆流入坑内，若准证不及早批下，原先的工作努力将付诸东流。四五月间，总理外务秘书致函总商会，说明准证批下之前，商会得提供下列资料：一、出土的遗骨将如何储存，又将葬于何处；二、提供遗骸人数及其国籍；三、提供通报遗骸地点者的资料。

两个多月过去了，挖掘准字仍未批下。总商会诸君于6月底拜会总理。这次商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政府提起一件往事：1949年，殖民地政府曾批下“新加坡华人鸣冤委员会”申请挖掘遗骸的准字，并建议以汤申路某处作为埋葬遗骸的地点。这则信息，引发了两个不同组织申请挖掘遗骸的问题。政府建议，双方应沟通协调，



文物局在1995年为当年于榜鹅海边被害者设立纪念碑，本来刻有四大语文。现在只有英文说明，也少了被害者的人数。（林少彬摄于2003）

确定由何方负责此事。新加坡华人鸣冤委员会是日本投降翌年（194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任务是调查日本侵占新马时期华人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并收集证据供战犯法庭参考。当时的鸣冤委员会主席是郑古悦、副主席杨缙文；正副总务为庄惠泉与黄奕欢。

商会与总理谈商个把月后，再度与他会面，呈报有关挖掘遗骸、埋葬遗骨方式与项目经费来源的具体状况。这次会晤，也达成了赔偿问题交由殖民地宗主国与日本政府处理的共识。7月23日，挖掘准证批下，商会继续与官方商讨埋葬遗骨问题。总商会最初主张的埋葬地点是汤申路一带，但卫生部官员建议的地点是蔡厝港坟山附近。双方代表曾多次前往蔡厝港视察，商会认为该地形势欠佳，且建造费用不菲而没有同意，因此直到1963年初，集体埋葬地点一事仍悬而未决。几经周章之后，骨骸最终在1966年安置于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底下。

1962年9月左右，本地学子都收到一本由教育部提供的精美空白册

子，校方每周分发不同主题的彩色图片，让学生张贴在本子里，由此开步认识马来西亚。同学们唱邦歌之余，也开始学习一首名为《NEGARAKU》的未来国歌。小学生不明白背后的故事，更不知晓那一年发生了轰动社会的“冷藏行动”；有过一回为新马合并而举行的激烈政党辩论和全民公投；更无法感悟那年挖掘二战蒙难者遗骸的意义。半世纪后，这群小朋友已老成花甲之人，他们曾经在炽热的炉边生活着，却不一定明白大炉里煎熬的是怎样的政治菜肴。历史就这样默然向前滚动，它书写的字迹，因个人的老花程度而呈现不同的清晰或模糊状态。我随着显微影片的镜头，看到的不过是许许多多的历史碎片，透露的是“大检证”千万悲剧中单薄的段子，一时无法让画面完整构成，却也感知到这次挖掘，让长期包扎着战争精神伤痛的岛民，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宿。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